

国际关系理论

前沿

译丛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观念与外交政策

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

Edited by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美〕 朱迪斯·戈尔茨坦 罗伯特·O.基欧汉 编

刘东国 于军 译

刘东国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观念与外交政策

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

Edited by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美〕 朱迪斯·戈尔茨坦 罗伯特·O.基欧汉 编

刘东国 于军 译

刘东国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2-509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美)戈尔茨坦,(美)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ISBN 7-301-08603-2

I. 观… II. ①戈… ②基… ③刘… ④于… III. 对外政策—研究
IV. D8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690 号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edited by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Copyright © 1993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3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

著作责任者:[美]朱迪斯·戈尔茨坦 罗伯特·O.基欧汉 编

责任编辑:金娟萍

标准书号:ISBN 7-301-08603-2/D·107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0 印张 300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委员会

主 编：赵宝煦教授，北京大学

副主编：秦亚青教授，外交学院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门洪华博士，中共中央党校

王 杰教授，北京大学

王逸舟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王缉思教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时殷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 编辑顾问委员会

主任：罗伯特·O. 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教授，杜克大学
委员(按英文姓氏笔画为序)：

江忆恩(Iain A. Johnston)教授，哈佛大学

彼得·J. 卡曾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教授，康奈尔大学

斯蒂芬·D. 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教授，斯坦福大学

海伦·V. 米尔纳(Helen V. Milner)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教授，明尼苏达大学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哈佛大学

鸣 谢

若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外交政策项目的资助,本书将不会存在。由于 SSRC 外交政策项目同意为那些对类似外交政策课题感兴趣的学者举办研讨会提供资助,所以在 1988 年构想了本书的研究计划。当时,我们二人都是外交政策的研究人员。本课题的启动始于 1989 年 1 月召开的一次研讨会。那次讨论之后,我们请求 SSRC 为另外两个会议提供资助,以便能够召集更多的学者来考虑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1990 年 1 月和 1991 年 4 月的两次学术会议都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召开的。这两次学术研讨会的参加者对于本计划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提交了备忘录和论文,有的仅仅是参加。其中包括:安妮·玛丽·伯利(Anne-Marie Burley)、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 Frieden)、厄恩斯特·B·哈斯(Ernst B. Haas)、彼得·哈斯(Peter Haas)、彼得·霍尔(Peter Hall)、戴维·拉姆斯登(David Lumsdaine)、理查德·马森(Richard Madsen)、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约翰·奥德尔(John Odell)、肯尼斯·奥耶(Kenneth Oye)、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杰克·拉科夫(Jack Rakove)、道格拉斯·里弗斯(Douglas Rivers)、约翰·鲁杰(John Ruggie)、贾尼斯·汤姆森(Janice Thomson)。

我们感谢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作为 SSRC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他对此项研究计划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如果没有他在学术和物质上的支持,就不会有本书的问世。

我们向为本书撰稿的所有其他十位学者表示我们的谢意。不仅他们的学术指导对于本研究计划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还要感谢他们对我们所提出的常常是不受欢迎的挑剔和反复的修改要求所保持的耐心。

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

撰稿人简介

约翰·费雷约翰(John Ferejohn): 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政治学教授和高级研究员。

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约翰·A. 霍尔(John A. Hall): 麦克吉尔(McGill)大学社会学教授。

尼娜·P. 哈尔彭(Nina P. Halpern):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G.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罗伯特·H. 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彼得·J. 卡曾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 康奈尔大学小瓦尔特·S. 卡彭特(Walter S. Carpenter Jr.) 国际研究教授。

罗伯特·O. 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 哈佛大学斯坦菲尔德(Stanfield)国际和平教授。

斯蒂芬·D. 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 斯坦福大学格雷厄姆·斯图尔特(Graham Stuart)政治学教授。

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 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巴里·R. 魏因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 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政治学教授和高级研究员。

总 序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任何知识谱系又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住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闪光的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革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编织了学理思想运动的脉络,形成了知识生成发展的宏线。国际关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显现出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宏线。仅从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核心内容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天地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成为无数国际关系学者毕其终生心血所奉献的事业。作为学者,他们探索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作为人,他们希冀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和人的幸福。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

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发表,到1979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虽然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华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

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是高度稳定的因素,所以,国际冲突从根本上是不可更变的。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巅,标志性著作就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1979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华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耀目的结构主义理论大厦。在战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1957)、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1959)、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的《界定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比价》(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等等。虽然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但是他们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减弱国际无政府性和因之产生的冲突。他们认为,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何种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战后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重大结晶,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可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

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宣言。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拉格(John Ruggie)等人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3年,国际关系学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新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规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规制研究和争论的文章,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也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入了基欧汉和拉格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的抨击。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1993年,鲍德温(David Baldwin)编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文集,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天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Kennith Oye)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6)、斯坦(Arthur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90)、拉格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1993)、巴赞和利特尔(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1993)等。如果说这些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可以具有同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话,这个特点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问世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它在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启迪和激发 20 世纪 90 年代跻身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93 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了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重要过渡性著作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建构主义的兴起作出了铺垫。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2 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它完全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也可以是友好合作,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冲突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学理辩论爆发了。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6 年,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Ronald Jepperson)对建构主义理论的阐述,也收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的优秀实证性论

文。此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6)、凯克(Margaret Keck)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超越边界的行动者: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的《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1998)、韦尔兹(Jutta Weldes)的《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属建构主义范畴的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1998年,《国际组织》在纪念创刊50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曾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共同主编了专辑,全面阐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趋于成熟,一些学者开始将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称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包括非主流理论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论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学科的核心,也是智慧的精华。了解这些知识结晶,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大部分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还可以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走向。比如,从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十分迅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国际关系已经被许多人称为“显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20世纪90年代初,由周纪荣先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出版。这套翻译丛书贵在求精,尤其是收入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一部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另一部是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精品。这套译著的出版不仅引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功不可没。十年之后,王逸舟先生主编了《国际关系学当代名

著译丛》，将西方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新理念介绍过来，其中既有反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重要著作和新现实主义学者的新作，也有建构主义的专著。这套译丛贵在出新，使我国国际关系学子又一次接触到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成为他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同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翻译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作《霸权之后》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也在策划翻译和出版国际关系类著述。这些努力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毕竟还十分年轻，对西方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也还是起步伊始，因此，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翻译缺乏体系，既没有充分注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也未曾有意识跟踪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宏线。比如，我们的翻译作品以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这样很容易使国际关系的学生和读者形成一种失之偏颇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也难免使人们受到现实主义一家之言过于强烈的影响，将其视为惟一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这些重要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学理思维和对国际合作的积极认识也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的知识谱系无法得到完整的再现，使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宏线在读者的认识和思考中出现断裂。进而，我们的译本多是根据译者自己的好恶作出的选择，这些译著之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散散点点，难以使读者进行系统的知识积累。并且，国际关系译著中既有学理性著作，也有政策性分析，更有对国际关系走势和天下事态的大论宏议。虽然满目尽好书，但却不能系统反映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统主体、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

据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其宗旨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为蓝图、以主流理论发展宏线为基准，以学理思想为根本，聚焦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交锋的前沿，重点

译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

为了保证这一译丛的质量,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国际关系学著作翻译领域使用了中外方编委会合作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邀请我国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赵宝煦教授担任中方编委会主编,编委会成员都是我国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近十年内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和学理研究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的学者。他们既亲身经历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又谙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脉络。他们的加盟保证了这套译丛的系统性、学术性和前沿性。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还特意邀请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为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主任,并由基欧汉教授本人邀请了六名国际关系学界一流教授出任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领衔学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选定的每一本著作都是经过双方精心挑选和认真磋商之后确定的,尤其是基欧汉教授对每一本书精心推敲的负责精神,对保证译丛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的出版会使读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体系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认识,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使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向。我们也希望这套译丛成为国际关系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套译丛能够起到他山之石攻错的作用,使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批判,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

是为序。

秦亚青

2002年9月8日于京西厂洼

从新自由制度主义走向建构主义的桥梁*

——译者序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史上本体论争论的永恒主题。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物质实力与观念建构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如何也是区分不同理论流派和范式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实主义强调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标志的物质权势,否定观念、理想和文化的作
用。建构主义则相反,强调观念的作用是第一性的,物质实力发挥何
等作用取决于人们在观念上对它的解读。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观念
因素和物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由美国学者朱
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O.基欧汉共同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
一书的出版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
既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同新现实主义展开论战的一个重要成果,又是建
构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块基石。

一、本书产生的背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论战。第一次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1939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爱德华·卡尔发表《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一书,首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提出了挑战。1948年摩根索发表《国家间政治》一书则对理想主义构成了致命的一击。针对理想主义强调在理性与道义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国际联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构想,现实主义提出以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物质权势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要素,表现为物质财富和国家安全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中是苍白无力,没有任何

* 感谢门洪华研究员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由于他的指教,本文得以进一步完善。

实际意义的。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追求、维护和扩大国家的物质权势,而不应被观念、道德等非物质考虑束缚住手脚。一方面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以国际联盟为标志的国际和平秩序遭到彻底破产,再加上冷战格局的形成对军事实力产生出特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理想主义缺少理论的建树,所以在这场论战中理想主义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并退出历史舞台。从《国家间政治》发表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理论30年。它所提出的几个核心理论假设奠定了后来国际关系理论争论和发展的基础。^①

在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经历了一场方法论的争论。以卡尔·多伊奇等人为代表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之中,提倡用实证的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量化”和“精确性”的分析,通过运用博弈论、控制论、系统论、沟通论、模型分析等方法,力图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清晰化”、“科学化”和“系统化”。而坚持用哲学、历史学、法学等传统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则对这一方法提出了质疑,从而形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上的第二次论战。这次论战大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和视角,被人们称之为“方法论的革命”。^②

到70年代末,国际关系的争论焦点又重新回到了本体论问题上。原因是经历了殖民主义体系崩溃、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打击的西方世界整体实力遭到削弱,使人们对现实主义基于物质主义所强调的实力政策和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产生了质疑。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进行了否定:第一,否定了

①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六点假设:(1)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2)国际社会在本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3)国际结构存在着等级制特征;(4)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体,不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5)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6)追逐以军事实力为主的权力是国家行为的主要目标。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

② 有关这次争论的详细内容,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118页。

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除国家之外,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否定了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认为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三,认为动用武力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际机制变迁的四种模式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①该书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正式形成。

面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现实主义自身也开始做出调整。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现实主义的正式形成,从而确立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比肩而立,共同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面,同时引发了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

在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主要集中在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问题上。基欧汉等人相继发表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4)和《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1986)等著作,进一步论述了国际机制对于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引起了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一些强调国内政治的学者虽同情基欧汉对华尔兹的批判,但却抱怨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注重系统层次,而忽略了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和一些具有建构主义思想苗头的人批评说,主流两派都只注重物质层面,但却忽略了单元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物质层面,比如文化、观念、价值、国际化的规范、身份认同等。^②

一方面是对这些批评(基欧汉将其称之为“反思主义”)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为进一步扩展同现实主义的论战范围,进而修补自身理论在体系完整性方面存在的缺陷,基欧汉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对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调整。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有关对基欧汉和华尔兹论战的批评,参见美国政治学协会对基欧汉的介绍:
<http://www.apsanet.org/PS/sept99/keohane.cfm>